

欽點天下第一樓：乾隆與天一閣獨特關係探析

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Affinity to Tianyi Pavilion: A Cognitive Exploration

袁 逸

Yi Yuan

浙江圖書館

Research Librarian, Zhejiang Library

E-mail: yuany@zjlib.net.cn

【摘要 Abstract】

本文考證了乾隆對天一閣藏書樓由無知到知悉、到賞識、到極力推崇的認知過程，分析了天一閣得以獨享恩寵的原因，及天一閣典範意義對後世藏書事業的影響。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Emperor Qianlong's affinity to the Imperial library, Tianyi Pavilion. Along with the cognitive explor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erial library was offered as a model for modern library business.

關鍵詞 Keyword

藏書樓 天一閣 乾隆

Ancient Library ; Tianyi Pavilion Library ; Qianlong



壹、前言

「藏書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爲巨擘。」這斬釘截鐵的評斷出自乾隆皇帝的至尊之口，時間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距今 227 年。

一個是大清盛世雄略有爲的當朝天子，一個是江南邊邑深院閉鎖的前朝書樓，二者本無一絲關聯，半點瓜葛。乃因皇家編修《四庫全書》之興師動眾遍徵天下遺書，後者半係惶恐半係虔誠，傾樓奉獻了當世罕見的大量舊藏，前者邊是驚詫邊是欣喜，聖視天聽關注起這座江南小樓的滄桑人事，於是二者之間便發生了關係，一種甚不合常規卻日見深切影響廣泛的關係。「一朝選在君王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歷史又演繹了相似的一幕，只是內涵大變，主角已由好色的唐明皇與藏嬌的楊貴妃改換成了好書的乾隆帝與藏書的天一閣。乾隆對天一閣由衷激賞高度評價，由此在中國數千年藏書史上，在其時數以千計民間藏書樓中，史無前例地樹起了一杆欽定旗幟，推舉了一個專業典範，並進而倡導了一種藏書榮耀的社會風尚。寧波天一閣藏書樓也從此走出自閉孤守的落寞，而在眩目光環下身不由己地成了私家藏書樓的形象代理，成了天下藏書第一樓。如此「一覽眾山小」的獨尊地位，既是天一閣獨一無二的厚重歷史與超群實力綜合顯示的必然，也與乾隆的天子之尊慧眼識珠，鼎力褒舉，密不可分。

貳、乾隆對天一閣認知的發展

可以肯定地說，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乾隆對於宇內民間藏書的情況知之不多，對天一閣的存在幾無所知，形同聾盲。此後，隨著《四庫全書》徵書運動的漸深展開，事情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且看乾隆有關天一閣的一系列言論，按年序列出。

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諭旨：「……且江浙諸

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

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諭旨：「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萬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亦指不勝屈。」

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諭旨：「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皆其累世弄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

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諭旨：「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其法甚精。……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

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旨：「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藏，深可嘉尚。」

四十年御制《文源閣記》：「藏書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爲巨擘。……既圖以來，乃知其閣建自嘉靖末，至於今二百一十餘年。」

乾隆涉及天一閣的言論還有一些，上述摘錄其較典型者。從所錄可清晰地看出乾隆對天一閣的認知是逐年、逐月乃至逐日在加深、發展的。從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第一則諭旨可知其僅概略地瞭解江浙多著名藏書家這一基本事實，屬十分初級和業餘的程度。相隔僅一天，他便從有關渠道知曉了更多的情況，具體地開列了一串著名藏書樓的名單。這個名單仍按江蘇、浙江的次序，並以他認可的著名度排列，天一閣名次殿後。由於有關資訊的誤傳，致使乾隆將天一閣主人的姓氏搞錯了，范氏成了「萬」氏，剛好寧波正有個萬氏望族。但畢竟，這已是一個可喜可貴的轉折，說明天一閣的名字已開始印在了乾隆的腦海裏，也說明乾隆對藏書家的認知開始從只見森林不識樹木，轉向步入森林熟悉樹木的過程。第三、四、五則諭旨則反映了乾隆主要依據一年多來爲《四庫全書》進獻藏書的數量多寡、貢獻大小，對民間藏書家的重新排名。



如果說在五月十四日諭旨中乾隆對天一閣的賞識多少還有所保留、猶豫的話（天一閣排在鮑氏之後，名列第二），那麼，四十天後，乾隆對天一閣地位的認定又進了一步，並已十分明確、清晰。其原因不僅在於「所進之書最多」，還包含有欣賞其藏書之法甚精，藏書留存久遠等因素。進而在一個月後的諭旨中，天一閣已儼然成為全國民間藏書樓的領頭羊。其後，在《文源閣記》中，天一閣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得以最終強固和底定。天一閣已不僅僅是藏書樓中第一名，而且已躍升為鶴立雞群的明星，把眾多同時代原來規模相當、平起平坐的著名藏書家若鮑、汪、馬等輩遠遠拋在了後面。天一閣聲名由是登峰造極，並傳播久遠。

乾隆對天一閣認知的軌跡可概括為：從一無所知到有所聞知；從知之不多，知之浮淺，到知之較多，瞭解漸深；從一律看待，例行褒嘉，到另眼看待青睞有加，由衷推舉備極恩寵。

深居紫禁城中的古稀天子以編修《四庫全書》為發端，信步邁入了浩如林海的民間藏書樓，且遊且賞且思，對整個民間藏書事業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終於發現了好大的一棵參天古樹——天一閣後，其心中已為天下的藏書樓選定了一杆尺規，他要在其文治偉業中再錦上添花。

參、乾隆何以青睞天一閣

天一閣在乾隆心目中具有無可攀比的綜合優勢。細述之，以下幾點尤為顯著。

一、為《四庫全書》獻書多，質量高，貢獻大

當年，向《四庫全書》進獻藏書超過五百種以上者全國共四家，他們是馬裕家 685 種，鮑士恭家 626 種，范懋柱家 602 種，汪啓淑家 524 種。（據《四庫采進書目》）但繆荃孫另有說法，他在《天一閣始末記》一文中寫道：「迨四庫館開，范氏進呈書六百三十八部，為藏書家之冠。」更權威的說

法來自乾隆，其於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諭旨中確指：「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無疑是依據當時直接負責官員的可靠報告。

姑且撇開以上分歧。從另一角度看，天一閣所進之書的巨大優勢更顯現無遺。據統計，《四庫全書總目》收錄的私家進獻藏書依次為：范懋柱 473 種，鮑士恭 379 種，馬裕 369 種，汪啓淑 260 種。（西嶋《天一閣與四庫全書》）因此，完全有理由認定天一閣向朝廷獻書最多，總體品質最高，自然也最得乾隆欣賞。

對天一閣進獻圖書的鍾愛之情，還可從乾隆的題詩中略窺一二。他在《周易要義》上題詩曰：「四庫廣搜羅，懋柱出珍藏。」在《意林》殘本上題詩為：「五卷終於物理論，太玄經下已亡之，設非天一閣珍弄，片羽安能忻見斯？」

乾隆對天一閣藏書的欣賞或許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天一閣不僅留存的珍善孤本多，且違禁逆鱗屬查抄銷毀的書卻幾乎沒有。范欽留下了一座書樓與七萬餘卷藏書，當年分析家產時長子范大沖放棄了誘人的一萬兩銀子而繼承了書樓和全部藏書。其後代有心護典卻無力添書，家道一直處於衰竭之中，守成尚已艱難，何談搜聚新藏？也正因其無力無為，便歪打正著，明末清初許多的違禁書便與天一閣絕了緣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的藏書家乃至業餘級的藏書者，向朝廷獻書無多，違禁之書卻觸目皆是，引得皇上肝火頻頻。如此比較之下，天一閣與眾不同的典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

二、建閣久遠，傳承良好

民間藏書樓歷代此興彼衰、你散我聚，鮮有超越三代百年者。乾隆對此自然是有所知曉，但不一定有較深的感觸。然而，當他陸續聽取了臣屬對江南一些著名藏書樓的調查報告後，感覺就大不一樣了。在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諭旨中，乾隆共提



到江浙六家藏書樓的大名，經兩地官員急急奔波調查，前五家徐、錢、項、朱、趙均早已樓圯毀，書散佚，子孫又多無讀書之人。惟范氏天一閣巍然獨存，其後代也一直慎守不怠。比較的結果使乾隆感慨天一閣完存二百一十餘年之大不易，對其大有好感。馬、鮑、汪三家即使獻書與天一閣旗鼓相當，也因欠缺了天一閣獨具的歷史的厚重而無法企及。

三、管理制度好，歷代執行嚴

天一閣制定的護書制度甚多，其要者包括：嚴禁煙火入閣，代不分書，書不出閣，非各房子孫齊至不得開鎖，嚴懲出借者和典鬻者等等。平心而論，這些規約並不顯得多麼創意、高明。其他的許多藏書家也各自制定有形形色色的清規戒律，有的甚至比天一閣更加嚴苛。但最終，許多規約徒成一紙空文，這些藏書家的後代甚至制定制度的當事者多已破壞了規矩。結果依然只能是樓毀書亡。天一閣的難能可貴不在於規制的周全，而在於子孫後代數百年如一日、百千人共一心的謹戒克守。無論世道治亂，無論家族興衰，無論藏書多寡，星移斗轉，制度不破。繆荃孫的親身經歷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那是光緒三十四年，繆氏陪隨寧波太守夏閏枝去天一閣看書，「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一地之尊的太守尚須嚴守規矩，何況他人！而此事已是晚清的動蕩時期，天一閣的存在也已三百三十餘年。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書久而不散，則難之又難矣！」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中的這段開首語，已是對天一閣藏書久聚不散的極大讚揚和勉勵。其後八十年，當乾隆徵書親身體驗了因嚴守制度帶來的實惠時，他能不由衷的賞識、讚美天一閣的制度及其守書人！

四、樓園設計好，樓名出典好

天一閣樓園之設計，集中地體現了主人防火剋

火的中心思想，顯然，這是從歷代書樓多毀於火的慘痛教訓而來。其書樓內部格局為樓上一統間，樓下六隔間，依據的是《易經》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火不容，以水剋火的玄奧之義；其閣前鑿池，蓄水以備，為的也是防火滅火；其書樓與住宅別院隔離，自然杜絕了宅火可能的殃及。對天一閣樓園建築的上述特色，乾隆激賞之至，全部接受照搬。《四庫全書》的內廷四閣及南三閣均按乾隆旨意，依樣畫葫蘆，在神州南北興建了一群天一閣。似這般皇家如此虔誠學習、摹仿民間的事可算千古未聞。

不僅僅如此而已。乾隆對天一閣的癡迷已到了無微不至，愛屋及烏的地步。他甚至覺得天一閣的樓名也是百裏挑一的經典之作，不單好聽氣派，更具有克火護書的獨特功能。也因此，《四庫全書》內廷四閣文淵、文源、文津、文溯之名皆從水而立。乾隆以其罕見的率真坦誠了自己思維之肇始：「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四十七年御制《文溯閣記》）。後建的南三閣中，文匯、文瀾也皆一例從水。

「三千寵愛在一身」，正是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疊加，才使乾隆對天一閣情有獨鍾，寵喜無雙。

肆、乾隆褒舉天一閣的意義及其影響

乾隆之於天一閣史無前例的極度賞識與薦舉，其盛朝聖主的浩蕩皇恩遠不止福澤一地一樓，而是光芒萬丈，甘露普降，對當世及其後天下的藏書事業與文化發展影響至巨。概言之，以下三點為其要者——

一、推舉了一種模式，樹起了一桿旗幟

中國的私家藏書樓薪傳澤遺，野火春風，千百年來歷盡曲折險阻，始終在發展壯大中。但封建私有制下的民間藏書樓卻也歷來處於自生自滅、各行



其是的散漫無序狀態，各書樓之間或有交流、合作、競爭等關係，但總體上因資訊傳播與相互交流的困難，藏書業始終缺乏權威的號召，仿效的樣板，追趕的目標。乾隆的言行可說一舉改變了千年沿襲的封閉自賞，無論魏晉的格局。他以遮天巨掌一手擎起了天一閣這面大旗，以一言九鼎的至高權威號召天下的藏書樓（無論公私）向天一閣看齊，學天一閣典型。學些什麼？這位「古稀天子」例舉了許多：書樓樣式、庭園構築、護書思想、管理制度，以及樓名的選用等等。當然，殷勤無私地向朝廷傾樓獻書的赤誠嘉行也是非學不可的。

我們不妨再比較一下乾隆推舉前後天一閣的著名度與影響力。明清兩代，江南一地始終是中國民間藏書的首要和中心地區，在這塊錦繡之地聚集了數以千計的大大小的藏書之家，在相近的地域內許多藏書家互有交往，在日記、書信、題跋、目錄等各種文獻中多有載述。但在乾隆三十八年前，這許多的藏書家對天一閣卻鮮有聞知，少見提及。其主要原因自然與范氏後代閉戶獨守，與世無爭，不圖創業，但求守成密切相關。天一閣的孤寂無聞在客觀上使其保有了較長時間難得的寧靜和安耽。乾隆以後的情境便大不一樣了。許多的藏書家每每情不自禁地拿天一閣作為參照來作比較。且看以下數例——

例一：錢泰吉《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序》：「……則拜經樓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而為浙東西宛委之藏也。」

例二：盧址《抱經樓記》：「吾鄉之善聚書者，首稱范氏天一閣。嘗愛其取之精而藏之久，以余駑下，豈敢望其項背。」

例三：黃澄量《五桂樓書目》：「今世藏書之家，惟寧波天一閣為最久。其制……。」

例四：阮元《焦山書藏條例》：「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

例五：李宗蓮《韻宋樓藏書志序》：「天下藏書

家為人人推服無異辭者，莫如四明天一閣。」

……………

判若雲泥的兩種際遇充分顯示了乾隆薦舉天一閣的極大影響力。

二、開了一個先例，倡導了一種價值觀

這個先例便是大張旗鼓、多種形式地褒獎有貢獻的藏書家，這種褒獎秦漢以降不曾有過，乾隆身後未曾再見。這種價值觀便是宣揚藏書是修養身家、惠澤社會的典雅之事，高尚之事，藏書有成可贏得朝廷褒獎，家族榮耀，社會美譽和地位；可當世揚名，青史流芳。

乾隆對以天一閣為首的藏書家的褒獎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特准在欽定典籍上留名傳播，在《四庫全書總目》的有關條目中注明某書係某人所原藏，「以彰各家珍弄資益之善。」具體還分兩種待遇：「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古之家，應即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採訪所得附載於後。」（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諭旨）於是，隨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廣泛傳播，范氏天一閣等藏書大家聲名遠揚四海九州。這近乎奇蹟般的效應唯有乾隆這種地位的人才有能力創造。

二是在進獻圖書中擇其「精醇」之本，乾隆「親為評詠，題識簡端」，錄副後仍將原書發還各本家，以便使獻書者「益增榮幸」。可以想見，在當時若能獲賜皇上御筆墨寶，對尋常百姓而言該是何等的至榮至貴！而乾隆居然十分主動地想要這麼做。雖然事後發還原書的事並沒能很好得到落實，但從乾隆這份多少有點自作多情的心思看，他對有所貢獻的藏書家確實是思圖別加恩寵的。

三是大規模賜書。對范、鮑、馬、汪四大家各賞賜武英殿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這部巨典全書一萬卷、五千零二十冊，雍正六年一共才印了六十四部。此前民間但聞其名，皆無緣一睹尊



容，何況擁有？！就其物質性和稀貴程度而言，乾隆這份厚禮是足以彌補上述四家藏書樓因獻書而造成的減失。對獻書一百種以上的藏書家各賜予內府初印本《佩文韻府》一部，「以示嘉獎」，「以爲好古之勸」。實際的賞賜還遠不止這些，直至乾隆五十四年，天一閣等還陸續地獲賜殿版各種典籍。可見乾隆對天一閣的關愛與熱情十數年如一日，持久而不衰。

乾隆的一系列轟轟烈烈、大事張揚的褒獎、賞賜，無疑使全社會皆以藏書爲要務，藏書爲榮耀。可以說往昔無足輕重的藏書家的社會地位至乾隆時期已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不少的藏書家已享受了一些高官鴻儒沒能享受的破格禮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何況康熙以來不曾間斷的文字獄的腥風血雨早已使天下的讀書人飽受驚嚇，無所適從。乾隆之禮遇、厚待有貢獻的藏書家，猶如在山重水覆走投無路之際爲讀書人指點了柳暗花明燈火闌珊的前景。於是，乾嘉時期聲勢壯盛的民間藏書高潮的興起便順理而成章了。乾嘉四大藏書家眾星拱月般的出現也就十分必然了。

一個反面的例子也頗能印證一些藏書家爲獲得當道褒獎、社會榮耀而藏書的典型心態。生活在嘉道時期上海的李修林藏書甚富，卻每常懷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深深遺憾，即感慨自己晚生了幾十年，未能趕上乾隆修《四庫全書》的盛舉，以致枉有這許多的精善之本卻不能呈獻朝廷，爭得榮耀。李氏的名不見經傳，多少說明其虛榮的遺恨並非毫無理由。

《四庫全書》徵書及伴隨產生的民間藏書的流失與大量典籍的遭禁毀，其功過得失非本文論述範圍。從某種程度講，正是《四庫全書》的徵集，爲鎖在深院人未識的天一閣提供了百年不遇的亮相出世、揚名寰宇的機會。乾隆的褒獎及御賜《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的入閣珍藏，給久已遲暮、消息的范氏家族及時注射了一針強心劑，重又振作並強固

了范氏天一閣護衛遺藏、不辱祖命皇恩的決心。我們當然無法推測假如沒有乾隆的鼎力薦舉，天一閣會否著名於世？能否留存至今？但可以十分地肯定，天一閣的譽滿天下與傲世長存絕對有乾隆的一份功德。

三、建江南三閣，促典籍流播

以天一閣爲代表的江南藏書家對《四庫全書》巨大且不可替代的貢獻，及該地違禁之書的多如牛毛，使乾隆於大喜且震驚中深切地認識了江南人文的獨特且倔強的優勢和潛力，認識到了籠絡、撫慰江南士人，使之消除隱患，爲其所用的迫切需要。《四庫全書》北四閣抄就後，乾隆便付諸行動，以建造南三閣，加抄三部《四庫全書》頒藏之作回報與應對，並明白曉諭三閣藏書准各省士子借閱。於是，江南的讀書人和藏書家又多了一處閱借抄錄的聖殿，民間藏書中也多了一類以「閣抄本」名之的高檔次的品種。以前秘藏不露的大量民間珍籍終於通過南三閣的仲介而遍播大江兩岸的千樓萬戶，天一閣之藏書精華也就化作了天下之藏書，任何的天災人禍也莫之奈何了。乾隆建造南三閣實施敞開借閱，極大推動了典籍在民間的傳播，更以政府藏書樓的大膽實驗向民間宣傳和示範了藏書貴流通、藏書嘉惠士林的觀念。乾隆並未刻板拘泥於天一閣具體規制的因襲，因時有所創新，有所突破，正顯其遠見卓識之處。

事必躬親，不厭細煩，一個專制帝皇對藏書事業如此熱衷、用心，確乎前無古人，後乏來者。行文至此，不禁產生有一個奇異的念頭：假如，當年范懋柱要搞一個天一閣創建二百二十周年之類的慶典紀念，請皇上題個匾，賜個名，我想，乾隆是會樂於應允的，並且，還會特派欽差大臣（級別當在政治局委員以上）前往祝賀，剪綵；假如，由天一閣起頭成立一個全國藏書家協會之類的組織，請乾隆擔任個名譽會長什麼的，或許也並非不可思



議。對於他所鍾愛的，乾隆並不吝吝他的恩寵，也不無可愛之處。

明嘉靖年間，范欽建造了天一閣藏書樓。

二百一十餘年後，乾隆造就了天一閣歷史的輝

煌。

又二百二十餘年後今天，天一閣老樹崢嶸，勃興遠甚當年。

(收稿日期：2003年5月15日)

參考書目：

- 1.任繼愈編。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
- 3.虞浩旭編。天一閣論叢。寧波：寧波出版社，1996年11月。
- 4.黃建國、高躍新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7月。

